

##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相 就像一道贯穿中国灵魂的伤疤

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它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创伤，就不可能了解中国。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一些年轻人仍然深情地回望它？

塔尼亚·布兰纳根

这是《[红色记忆：生活、记忆和遗忘中国的文化革命](#)》中经过编辑的预出版版本，由Faber出版社于2月2日出版。

从远处看，你可能会误以为他们是青少年，尽管他们是中年人。这不仅仅是与她们苗条身材相称的迷你裙和高跟鞋，也不仅仅是马尾辫和火红的口红，而是妇女们手拉手、抚摸手臂、按摩肩膀、抚平袖子和拉直包带的少女式方式，让人感到亲切。他们的妆容很浓，眉毛画得很粗，长发染成黑色或染成金色--这是他们从未享受过的青春的再现。

黄阿姨满怀希望地看着几个学生在重庆大学的校园里走过，这里是一片绿洲，有棕榈树、柳树和大片竹林。我们依偎在湖边的一个小亭子里。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我想做很多事情，比如上大学，但我不能，"她告诉我，"我当时18岁。我觉得没有希望了。如果一个人哭了，所有人都开始哭了。那是一种颓废。绝望'。

1968年底，中国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挤满了抽泣的青少年和惊恐的父母。当局下令，被毛泽东部署为文化大革命突击队的青少年应该在农村开始新的生活。年轻人潮水般涌向贫困的村庄。黄阿姨和她的朋友也在其中。一千七百万青少年，足够他们自己的整个国家的人口，被送到数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没有电或自来水的地方，有些地方无法通过公路到达。党称其为'上山下乡'，表明这些年轻人要在其中扎根的崇高的理由和卑微的土地。有些人年仅14岁。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晚。

这些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再教育。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将推动沉浸在贫困和无知中的村庄，改善卫生状况，普及识字，消除迷信。但农民的任务是根除一种更深层次的无知：城市精英对大众的漠视。毛泽东曾宣称农村的穷人是革命的动力，使共产党取得政权。现在，他们必须重新塑造这年轻的一代--教他们一无所有地生活，忍受甚至热爱最肮脏的劳动；为了更大的利益，不仅要做出牺牲，而且要抹杀自己。改造后的青少年将把他的革命推向最终的胜利：一个社会和文化与政治制度一样都是共产主义的国家。

'一开始，我们都是理想主义。黄阿姨回忆说，"我们想为农村做出改变。但是，这些村庄又脏又荒，狡猾的农民对新来者的伟大改进理论不以为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被敦促改造世界，但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改变什么。一些农民公开表示敌意，即使是友好的农民也变得更恼火。他们不需要多余的手，他们不想养活多余的嘴。这些年轻人，虽然有很多书和想法，但

他们动作缓慢，笨拙，对工具和土地没有感觉，浪费种子，不能处理最小的负担或不复杂的任务。收入的分配不是根据需要，而是根据工作的贡献；少年们努力争取养活自己所需的分数，工作让他们遍体鳞伤，水泡不断。

许多人发现，最初的额外口粮在干旱来临时很快就消失了，让他们和农民一样，靠玉米的糠秕生存。起初，他们可能与家人住在一起，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挤在还有空间的地方：旧粮仓、工具棚或自建的小屋，这些地方“往往看起来更像马厩甚至猪圈，而不是房子”，正如汉学家 Michel Bonnin 在其《迷失的一代》一书中写道。

很难想象，当他们终于可以把那些痛苦的岁月抛在脑后时，他们是多么松了一口气。然而，四十年后，黄阿姨和她的朋友们每周都会聚会，打麻将，吃火锅，跳舞，最重要的是，回忆那些苦难的日子。一天下午，他们在公园里练习舞步时，我偶然遇见了他们。我以为他们都是老朋友，但事实上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完全是基于他们对简单农村生活的体验。对于受教育青年友谊小组（我应他们的要求改了名字，那些成员也改了名字）来说，那些年的斗争是他们的‘精神财富’，顾阿姨说。‘我们为自己是受教育的青年而感到自豪；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在未来不会再发生。

这些人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孩子，在他死后十年才结束：十年的动荡、暴力和停滞。这场运动是一个皇帝对权力的无情宣扬，是在大跃进的灾难之后为了消灭党内的所有反对派而发起的--大跃进的工业化运动和农业的集体化，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大饥荒，多达4500万人死亡。但这也是一场讨伐行动，以改变人心和灵魂，就像毛泽东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一样。

为此，他求助于由年轻的政治活动家组成的红卫兵--许多人还只有十几岁--他们攻击教师和科学家，破坏文化珍品。估计将有两百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的两个王位继承人和中国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随着暴力的蔓延，偏远农村地区的民兵抢走了包括儿童在内的整个家庭的生命。巧合，如家庭成员被认为是地主或居住在国外，可能和被指控的政治犯罪一样致命。

数以千万计的人将被追杀。在黄阿姨和她的朋友们居住的西南城市重庆，红卫兵不同派别之间的战斗以战争结束。他们自己在那场激烈的暴力中没有发挥主导作用，但没有人能够完全逃脱：各派别充分利用该市的许多弹药厂，用重型武器和坦克作战--一位居民告诉我，除了飞机之外，什么都可以。

但到1968年底，毛泽东重新确立了他的绝对权威，甚至他也厌倦了这种混乱局面。军队遏制了红卫兵，有时是暴力的。由于大学甚至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关闭，城市的失业率很高，年轻人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去找麻烦：这就堕落为流氓行为，正如一家报纸所写的，是“不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事情。把他们送到农村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

今天，当局通常不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流亡是官方话语中唯一记得的方面，甚至是庆祝的。这些年轻人包括习近平：现在是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但当时是一个被贬低的高官习仲勋的十几岁的儿子。官方宣传强调了这位领导人如何在农村的岁月中成长和成熟，但实际上他从家庭的苦难中汲取的教训似乎更加复杂和模糊。

当习仲勋和其他党内长者在毛泽东去世后得到平反时，他们试图确保强人统治永远不会回来。他们将权力制度化和集体化：他们寻求共识，并采用不成文的规则，如有限的任期。然而，习仲勋的儿子拆除了本应保护党和国家免受毛主义灾难重演的变革。

习近平似乎已经得出结论，稳定中国--并确保其自身的未来--不需要稀释或缩减权力，而是需要加强权力。他当然不是毛泽东：显然，他不喜欢无序。他的国家比当时的国家更有教养，更成熟，也更愤世嫉俗。然而，他将权力集中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程度。去年年底，在党代会上，他以打破常规的第三任总书记的身份开始了无限期的统治。

在镇压日益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表示关切。但在10月的党代会开幕式上，一个孤独的人物在北京进行了抗议：他的横幅上的要求之一是："改革，而不是文化革命"。这一呼吁在几周后席卷各城市的反对零容忍政策的显著抗议活动中得到了其他人的响应。过去的回声并没有被忽视。



中国，广西，1965年。学生们在一个道路施工现场工作。整整一代人，被迫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已经被牺牲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都失业或被边缘化© Marc Riboud / Fund Marc Riboud / Magnum / ANP

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它决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它的伤疤贯穿了社会的心脏和公民的灵魂。它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和资本主义疯狂之间的支点，是无情的统一性和无情的个人主义之间的支点。它的结束标志着从毛泽东主义的决定性转折，而毛泽东主义已经被它的代价彻底抹杀。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和民主运动的摇篮，在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中达到高潮，但也促成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血腥镇压。文化大革命塑造了不幸福的家庭，对浪漫爱情的期望，对金钱的欲望，既苦涩又希望。她是国家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抹去它，今天的中国似乎毫无意义：就像没有帝国的英国，或没有内战的美国。

不幸的是，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一运动。毛泽东反复无常的性格、变幻莫测的策略和刻意隐晦的声明；党内高层的政治阴谋；运动中各个层面的利益和动机的冲突，包括琐碎的怨恨和平庸的野心；运动所经历的许多阶段；其庞大的规模--这些都是使其难以解开的因素。它们一起使她在许多方面变得不可理喻。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类似于20世纪可怕的种族灭绝，尽管在中国，人们谋杀了自己的同胞--受害者和肇事者之间的界限在不同的时刻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这让人想起了斯大林主义的清洗，但有群众的热情参与。与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其他悲剧不同，它是全方位的。没有一个工作场所没有被触及。没有一个家庭是无辜的。共谋"这个词太简单了--这是同志对同志，朋友对朋友，丈夫对妻子，孩子对父母。这种亲密的背叛和突然的逆转撕裂了中国的结构，撕裂了儒家的家庭服从的理想和较新的共产主义的兄弟关系的承诺。

然而，这个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时代，在今天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东西而存在。过去谈得比较多，但从来没有自由地谈过。有关其恐怖的报道有助于证明社会主义正统观念转向市场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内疚和官方的压制把它推到了阴影里。

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历史往往是作为道德的启蒙读物，而不是档案。甚至从执政的第一天起，该党就明白，它的统治不仅取决于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还取决于对这一承诺与以往苦难之间对比的共同理解。它建立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双子博物馆，敦促工人和农民"回忆过去的苦难，珍惜现在的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历史使命的呼吁--推翻外国压迫，使中国再次伟大--越来越响亮，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事实证明，习近平对过去特别敏感，他引用了一位古圣先贤的警告："要摧毁一个国家，你必须首先摧毁它的历史"。该党被警告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类似于西方民主的生存危险。

擦亮该党对其过去的版本，既需要忘记，也需要记住。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判决是由邓小平作出的，他曾两次被赶下台，但后来成为最高领导人，领导中国的转型。这一判决承认，该运动造成了该党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解释说，它是"由一个遭受误解的领导人发起的，并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因此，"文化大革命"比犯罪更糟糕--它是一个错误)。但没有人被允许沉浸在痛苦中。为了划清界限，邓小平告诉判决书的起草人，目的是'让人们团结起来，向前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不断回头看，随着红卫兵一代的老去，他们的人数也在增加。重庆教育界青年联谊会毫不掩饰对中国领导人的崇拜和支持的爱国情怀和盛情。但记忆并不总是如此包容。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不仅仅是怀旧，还有矛盾心理。

从1970年代末开始，前受教育青年的第一波回忆录和小说，抨击了被迫迁往农村的徒劳和无望。(对党来说，这种"伤痕文学"有其用处，它证实了毛泽东主义转向市场的智慧)。但是，正如一个破旧的小村庄的肮脏程度从远处看可以如诗如画一样，越到过去，流亡到农村的人就越有一种有益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了一个关于受教育青年日常生活的照片、回忆和纪念品的展览。该展览在两星期内吸引了十五万名参观者，并引发了类似的展览和对过去的向往。各小组组织了前往村庄的情感之旅。旅游局获利。

1989年的大屠杀摧毁了对中国未来的诱人憧憬，国有企业改制导致的大规模裁员挑战了许多曾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认同感，在这之后，向过去的转变也许并非巧合。也不知道随着中国变得更加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竞争和不可预测，她能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学家杨国斌分析了这一转变，指出它"对比了一个珍视美、意义和目的过去和一个日益被经济不平等和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现在"。

而随着这种对过去的渴望的增长，党开始看到它的力量。对困难时期的思乡之情并非中国独有。但是，虽然残酷的杀戮细节被埋没了，但被送走的青年的故事却变得更加突出。流亡到农村的人脱离了其狂热主义的根源，被重塑为一个空气清新、友爱和诚实劳作的时代。

习近平的创世神话是关于他在陕西省西北部的梁家河村七年的故事，他住在山坡上雕刻的一个狭窄、发霉的洞穴住宅里。对他自己来说，这可能同时感觉是一种逃避和惩罚。他的父亲已经被清洗，习近平也受到了红卫兵的攻击；朋友们说习近平的亲生母亲被迫放弃了她的儿子。据报道，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多年的政治压力下自杀了。如果我不走，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死在北京，所以离开不是一件好事吗？"他曾经回忆说。

习近平成长为一个男人，拖着煤车，修建堤坝，种植玉米和土豆。他忍受着跳蚤、刺骨的寒冷、单调的饮食和更加单调的劳动。他在放羊的时候看书，或者看书到深夜。他帮助农民开发这个地方，加固河岸以阻止水土流失。他的模范奉献精神为他赢得了模范青年的称号。据说他用他的奖品--一辆电动三轮车--换取农具来帮助村民。甚至当地的党委书记也向他征求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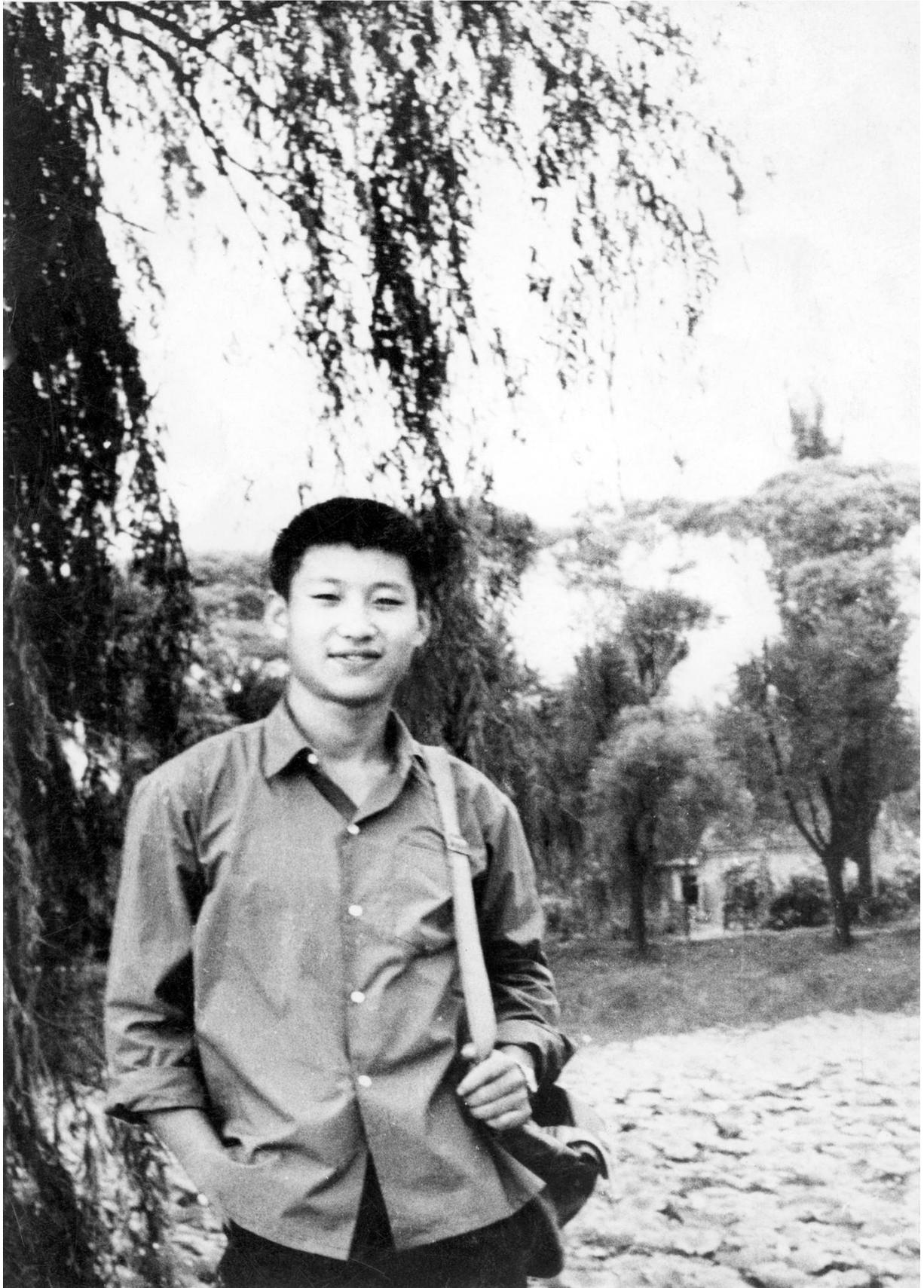
2015年，当他作为中国领导人回到梁家河时，他将这个位于赭石色黄土高原上的村庄描述为他生命真正开始的地方。习近平写道："当我15岁到达黄土地时，我感到焦虑和困惑。'当我在22岁时离开黄土地时，我的生活目标已经确定，我充满了自信。"

他的崛起使梁家河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游客--大部分是官员--来参观他的老房子，并欣赏他所挖的井。这个故事见证了习近平的胆识、他的纪律和他的谦逊。他的服务强调了

他无可挑剔的血统，是对他父亲的革命工作的呼应；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大众的人。他遭受过苦难，但他又能挺身而出。

在早期的采访中，他一直比较坦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版本失去了令人不舒服的细节。习近平所处的地区，人们对他的父亲记忆深刻，并倾向于照顾他，这并不是巧合。他们带着问题来敲他的门也不奇怪；更有可能的是，他可以认识可以帮助村民的人。虽然国家媒体描述了习近平如何搬运近100公斤的小麦，但村民们回忆说，这位未来的领导人在努力抬起他们自己可以轻松搬运的水桶时，是如何一屁股滑倒的。

但不管你怎么说，在城市和乡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增长得非常快的时候，在腐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有力的。它把农村的艰苦岁月变成了共产主义精神和纪律的胜利，与党内精英的富足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它强调了领导者理解什么是斗争。这也是事实：习近平一直在努力工作和学习；人们似乎喜欢和尊重他。他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底层生活的严酷性有一种本能的理理解，而这种理解很少有年轻人--或西方领导人--能够分享。尽管他的特权很重要，但这些特权只是为了缓解艰苦的条件和无情的工作。他还记得当他清理堵塞的管道时，粪便喷到他脸上的震撼。食物很差，而且永远都吃不饱，休息时间很少，无聊的人很多。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和村民们都在努力理解对方的讲话。那是一种孤独的生活。



习近平·"受教育的青年"在农村·1972年© 新华社/Eyevine/ANP

**顾阿姨的温柔天性在**她面前接纳了同学和邻居。她帮助一个被子女忽视的老寡妇收割。她和她的朋友们教村里的孩子，并为农民表演音乐节目。有幸福的时刻，甚至有友谊。然而，两种文化发生了冲突。农民们看到女孩和男孩走在一起，无论多么天真无邪，都感到震惊，当他们的行为蔓延到村里的年轻人身上时，农民们也感到震惊。毛泽东主义的清规戒律，将浪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与农村部分地区的深层保守主义相比，显得很自由。农村的男孩和女孩发生关系时，他们不敢看对方的眼睛，"黄姑姑说。

但城市女孩，天真无邪，远离家庭，很容易成为男人的猎物。通常情况下，受害者承担了责任--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镇居民，而强奸他们的人，是贫穷的农民或地方官员，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这既是一种道德地位，也是一种社会地位。恶毒的官员有无数种方法让你受苦：拒绝配给，给你分配最差的工作，或者指控你犯了政治罪。

黄阿姨的一个同学在14岁时被送到农村，在当时众多的偏执狂运动中，被指控为反党组织成员，死在监狱里。她失去了另一位朋友，他的重病被当作感冒而忽略了。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许多人死于疟疾、肺炎和其他疾病。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非自然"死亡，大多数是死于与工作有关事故。宣传品赞美这些无意义的牺牲，并鼓励年轻人做出新的无意义的行为：一名上海少年因在洪水中试图拯救木杆而溺水，被誉为烈士。一张海报显示他在海浪中，举起头和手臂，向观看的战友们喊出了最后的告诫。

回顾过去，这群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哀悼他们失去的朋友、失去的岁月和艰辛，但成员们也把苦难看作是这一切的真正意义。他们谈到那个时代时，就像老兵对出生太晚无法参加战争的年轻人所说的那样：带着遗憾，有时是蔑视或愤怒，以及不相信自己经历过战争，但也带着不可否认的优越感。它使他们更勇敢、更强大、更有能力。他们理解了别人无法理解的东西，也没有人能够再次理解。

习近平于1975年回到北京，比他的许多同龄人晚，但在一个黄金位置：作为一个重新开放的大学的学生。获得它的机会是由政治资格决定的。他的家庭关系可能是关键，他在几次被拒绝后成功入党。但大多数人需要运气、足智多谋和不屈不挠的动力来逃离农村。顾阿姨的一个同学勾引了一个在隔壁工作的已婚男人，知道他在军队里的漫长岁月可以让他在城市里定居。他得到了与妻子离婚的许可，与年轻女子结婚，并与她离开了农村。'但没过多久，所有受过教育的青年都可以回来了。所以她终究还是后悔了，'顾阿姨回忆说。

黄阿姨自己也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嫁到其中一个村庄，大大减少了你找到回家的机会，但她和她未来的丈夫得出结论，他们没有什么损失--他们都没有作为工人、农民或士兵所需的那种资格来离开。他们在1970年代初结婚，他们的儿子很快就出生了。一年多以后，当她的家乡需要工人时，她和她的儿子不得不独自去那里。又过了四年，她的丈夫才能加入他们。

最初，返回城市的机会很少。在年轻人争夺以工作或大学名额的形式逃离村庄的难得机会时，相互间的团结有所淡化。贿赂官员或诋毁对手比单纯的热心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女孩们被逼着用性来支付回家的路费。一些青年非常绝望，他们伤害了自己，希望能以健康为由被允许返回。

从1975年开始，回归的步伐加快，尽管这一年也有超过200万新的青年来到农村地区。绝望慢慢地发展为大规模的抵抗，并在1978年发展为公开的抗议：受过教育的青年开始罢工、示威、写小册子和占领房舍，要求被允许回家。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变得坚韧不拔--他们知道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进展。两年后，当局取消了农村再教育计划，但仍有近百万人留在那里，现在已经结婚生子，或被环境打败。

黄阿姨说：“我们回来的时候并不容易，我们要争取回到城市生活中去。‘我们不再那么年轻了。我们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我们中的一些人有家庭，必须养活他们，而我们则试图掌握生存的技能’。

他们在农村受苦多年；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对城市也没有什么贡献。他们不仅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而且还失去了机会。经过多年的关闭，对大学名额的竞争非常激烈，只有最出色和最坚定的候选人才有机会。年轻的工人们后来都毕业了。一些回归者从事了临时的低技能工作。走投无路的人求助于性工作和犯罪。另一些人则发现，艰难困苦激励了他们。他们成为企业家，抓住经济改革的机会，而经济改革的部分原因是当局需要对这些人有所作为。

他们现在在他们以前热衷于逃离的地方花费如此多的时间，这并没有让重庆小组感到奇怪。那些年的苦难是他们的特点，代表着自我牺牲、社区和决心。他们赢得了他们的家，他们的晚餐，他们的口红和花式连衣裙。他们的故事得到了他们的领袖的认可，他和他们一样，不得不放弃。当文化大革命的其他部分被掩盖在视线之外，被推到过去的泥土深处时，一些经历被提升为国家叙事的一部分。

‘只是因为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我们回想起来时，我们只是想到了美好的事物。那时候，这一切都很痛苦，’黄阿姨承认。‘生活是如此悲惨--言语无法形容。但人们仍然觉得他们应该传承这种精神’。

这对他们来说有意义吗？难道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这只是浪费了他们最好的年华，从他们身上偷走了时间？‘是的，我也想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浪费的时间。但在我的记忆中，在某些方面，它也像我的一个宝库。我不能说我不后悔这段经历。但我也不能说我不懂感恩。这是你无能为力的事情’。

她又想了一会儿，然后眼前一亮。‘最棒的是，我们年轻时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以至于我们后来面临的苦难似乎都不算什么。这呼应了习近平的结论：“没有什么能比这更难的了。是她的笑容让我猝不及防。

